

評論

夏林清

一、「女性教師與教育改革」——一個抽離的認識歷程

張如慧做為一個高中輔導老師，是一位在 80 年代台灣大學校園成長的年輕女老師，80 年代校園中性別意識的衝擊對她到了高中教育環境中的思索是有清晰影響的。當張如慧這樣一位對性別經驗有覺醒意識的年輕女性選擇做一位高中教師時，她便進入了台灣教育環境中複雜、糾結的一個學校體制中工作，而這一個「工作」的角色位置是和一名大學女學生或研究生的社會角色是很不相同的。「教師」無可避免地得承擔與發揮維持既存教育體制運作的功能（即便自己不苟同體制所規約出來的這一種功能性角色），然而「教師」對教育的改造力量，也唯有在當教師確認與洞悉這一種結構性處境所蘊含著的矛盾張力，並「活」在其中，奮力爭鬥地耕耘出一條能彰顯出教師與學生互為主體之教育實踐的通道時，「教改運動」才是紮根於教師身上的！我是由這樣一個體認來理解張如慧這篇文章反映了什麼樣的一個歷程。

張如慧書寫完成這篇論文的行動本身反映了她的一個認識歷程——「做為一個年輕女教師，她是站在一個怎樣的認識點上，去推進這一個『認識女教師』與『教育改革』之間的『聯繫關係』的歷程」；而這一個認識歷程回過頭來又對自己作一個「女教師」的「經驗與意識」發生了什麼樣的形塑回饋作用。面對一位年輕女教師認真的思索與追尋歷程，我分兩部份回應：

如前所言，張如慧書寫此篇論文的行動也就是她如何發現「女教師」與所謂的「教改」間的「聯繫」的一個認識歷程。首先要肯定一位年輕女教師這樣的企圖與認真的思索，然而在本文的前兩節中卻看到了作者對台灣「教改」現象的含混認識，與對教育環境與學校體制中女性教師「參與」的簡化設定。

張文的第一節中即已將改革者與實踐者對立起來，而這一個對立同時隱含地預設了男性教師（改革者）與女性教師（實踐者）的對立。這樣的一個提問的預設框架有什麼問題呢？

當我們把教改和女教師這兩個大類拿起來的時候，有個問號是：到底什麼叫做教改？台灣這幾年朗朗上口的教改到底是怎樣的一組現象？我想台灣目前所講的教改大概是教改會的教改、專家學者及教育部長的教改。面對這樣性質，我們難道不需要對台灣當前的「教改現象」先考察一下、分辨一下，再論「教改現象」與「女教師」間的「關係」嗎？我們可以就這樣輕率地將之等同於其他國家（歐美）的教改現象嗎？如果不可以的話，引用國外所謂女教師與教改的研究發現來鋪陳與支持自己的問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教師們跟教改到底是什麼關係？「進入教改多半是男老師」是指那一些具體現象呢？張如慧在論文的前面把改革者對立於實踐者，所謂的改革者可能比較是加入教改的男老師，這裡得打個問號。

如果所謂的教改是指教師會的話，可能加入教師會的男老師是比女老師多。可是，教師會就是作者所指的教改嗎？這裡要先回來問的是，張文到底是指涉了什麼樣的一個範疇？

我為什麼要這樣詢問呢？因為以我自己十多年來和中、小學教師的協同工作經驗來看，我根本不認為現階段的媒體教改言論及官方的教改政策稱得上是教改「運動」。我認為台灣要有教改的運動的話，除非等到台灣的中小學的基層老師變成能夠為學生的學習權益開始發言的一種教育工作者。（我覺得在台灣，中小學生們還遠的很，不知要到那一天才成為教改的主體。）也就是說，等到哪一

天老師覺得自己是一個教改的參與主體時，教改才有運動可言。

台灣這一陣子的教改主體，我認為是專家和大學的學者以及少數中產階級的、比較能夠用家長身份在社會發言的父母。我一定要這樣講，台灣已經有家長會聯合會，但基本上我不認為那代表我們多數的家長。所以，張文在這裡是以一個很快的、整體的、簡化的框架，把性別的二分（男 vs 女）與改革和實踐的二分，做了一個很簡單的聯繫。我認為這樣的提問方式看起來對張如慧一個這樣的高中老師具有某種「女性意識」的動員作用，所以她進行了這篇研究，但是我覺得把這樣的提問帶到第二個階段，透過一系列的論述所建構的一個讓她自己找路的方法，卻是有問題的。

（2）「女教師」實踐主體不見了

張文第二頁中明確陳述：

……因此，以下將以目前一些積極投入教育改革的女性學校教師為研究焦點，並從性別角色的觀點，來檢討女教師在學校環境即改革中的不利地位，尋找有助女性教師參與改革的相關因素，以提供達成兩性平等的另一種思考途徑。

這段話的意思也就是，作者選擇了幾位積極投入教改的女教師做為了解的對象，但她們的經驗是被作者當成「檢討女性教師在學校環境即改革中的不利地位」的「材料」，以「尋找有助的因素達成兩性平等的另一種思考」——而不是這幾個女老師何以能夠一步一步地運用她們僅有的資源，來轉化不利的處境，並在逐步參與的行動中發展出她們的力量。（「尋找」「因素」要提供給「誰」？研究的發現主要是為誰？對誰有利？）我在括弧中的反問要指出的，是張文尋找答案（回答自己提問）的方式反而使她「看不見」「遇不到」女教師的主體性及其實踐力量。讓我更詳細的用兩點來說：

（1.）採取進步姿態或立場的知識工作者（研究者）建構了一個討論批判「女教師」的位置，而處於這一個位置中的研究者對待

張文第七頁的上端對學校女教師的進步性提出了一個二分的設定：

……而身為學校教職員多數的女性教師，究竟是如何地轉化這套隱含性別歧視的不平等價值觀，還是全無反省力的接受了男性霸權意識形態的宰制呢？

這個提問方式對一個想為女教師尋找力量與出路的工作者十分重要！為什麼？因為從事批判論述的研究者很容易建構這樣的問題，而順著這種提問方式，自己很可能就輕易地站上一個批判反省或改革立場的位置。可是如果我現在接受一個這樣提問的框架，我就進入了「女教師是轉化還是接受了性別歧視不平等價值觀」的二分思考，然而我上了這個位置的同時，我其實是不自覺地貶抑了另外一半「接受男性霸權意識宰制的女人們」，而所謂的這種女人就是全無反省力的。我要批評這是一種不當的二分，因為這會讓一個站上批判思考位置的研究者（她同時自己也是一位女教師）在她的日常生活的領域裡面碰到了女老師們，就產生某一種不自覺的分類隔離與貶抑，反而比較難去接近女老師。其實我所接觸到的女老師們，沒有一個人是全無反省力的，只是她表現出來的形式是各種隱晦的抗拒與抵制（生存的防衛），為了她的生存而出現了一種半意識或有一點意識的包裹和包裝。這是我對張如慧前面提問過程的一個重要的批評。

（2.）「發現之旅」在「印證論述」的胡同中無法展開

我覺得張如慧是通過 4 位女老師的訪問之後，其實才開始了她的發現之旅，因此她的論文到後面也比較進入一個發現歷程。這 4 個案例帶領她去看到一個女老師怎麼樣在她日常教學的生活世界有一個起點開始啟動。可惜的是，對四位女教師的「了解」，不是採取一個探究她們如何成為或者擁有回來教育實踐力量的「敘說發現」的方法，而是因素辨識的資料處理方法。

今天接受張如慧訪問的「基層教師協會」的女教師們也有幾位在現場，我在過去 11 年中和這個協會的主要發起成員一直有協同的工作關係，所以對「女教師主體性及其實踐力量」這個主題感受特別深。接受張如慧訪問的 2 位基層教師的女老師，她們其實通過了一個極其細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她們學習去辨識自己在這麼複雜的一個扭曲和壓制的教育體制中，做為「女人」和「教師」，對一個基層教育工作者的力量是如何影響的。她們的確是通過對自己身上女性經驗的辨識才確認與肯定自己的女性意識，並且在面對學校體制的束縛時一起練習行動；這是到她們開始成立「基層教師協會」之前所經過的一個過程。這個協會中，基層女教師為多，但是裡面也有男教師。這裡的一個重點是，若以「基層教育實踐者」為角度來看時，被體制扭曲處於不利劣勢的也有男教師。

當我們探討教育體制中女教師的參與力量時，是否只選擇單一的性別分化的視框？只援用性別角色分化的檢討觀點是否反而使我們忽視了基層教育實踐者（不論男女）所共享的、被體制薰習與宰制的機制？簡化的性別分化所帶來的，在腦袋上「女性集結」的昂奮感覺，與學校女教師要能由各種體制化運作機制中伸出手腳所需要的實質的聯結支持力量，恐怕是兩碼子事。

總結來說，做為一個高中的年輕女老師，張文的努力非常有價值，希望她能通過這樣的一個過程，繼續自己的發現之旅，尋找如何與學校中其他女教師發展聯結，深入認識台灣女教師集體經驗的新途徑。

二、十年性研知多少？——聯手搭起一道防堵疏導的堤防

至於第二篇，讓我站到一個做為母親的角色來發言。我看這篇論文的時候帶給我了一些矛盾，我看完都能理解那十篇回顧性的香港論文，整個看完內容後，我給的題目是「聯手搭起一道防堵疏導的堤防」。研究者的工作是在醫院從事臨床心理師及在性改革的協

會裡面做一個研究員，作者選擇一個研究員而非性教育實務工作者的角色來探究問題，基本上選擇了一個稍微抽離、隔離一點的位置。在這樣一個研究的位置上，青少年的主體與青少年的情慾是怎麼被理解和對待的？

事實上，這篇論文對待青少年主體與情慾的立場是和學校教育與一般社會輔導機構一致的，也就是一種「疏導防堵」的教導策略。然而，面對活在聲光電化的傳媒與商品體系中的當代青少年，生產「疏導防堵」式教導策略的知識是無法回應青少年生活世界中的慾求與衝突的。

我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來自於我做一個「母親」的深刻體會。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好幾個角色，目前對我而言，最難演的就是家長的角色，在學校家長會裡面我碰到很多父母在台灣的現況中，很快的會選擇一個聯手起來撲滅青少年集體文化的位置。我昨天下午還在開家長會，家長會正在討論一個議題：校園裡面每年到畢業典禮的時候，男學生就在學校從屋頂上放鞭炮抗議學校的行動，而家長會在討論如何撲滅「幽靈砲火」。回到性的議題裡頭，我自己有個十七歲的女兒，她時常衝擊和挑戰我對當代青少年兩性經驗的不當評價。為什麼我讀完這篇論文覺得「又來防堵了」？雖然研究者最後強調的是「多變項楷模方法」的優點之一是「家長配合學校的性教育」，而我卻對當家長還沒有對自己進行一種意識反省的過程時，任何對「家長」的召喚極可能招來的都是更強化原來既存邏輯的一種圍堵。

我認為家長要進行自我反省成人學習是不易的一件事情，因為「家長」的重責大任會使父母們為了小孩「安全與穩當的發展」，義無反顧的撲向一個穩固既存邏輯的路線上去。隨手舉一個小例子，我女兒前天問我兩個問題。她問我的是：媽，男生是不是一直會想做愛？第二個，男生禁慾四十天，不自慰，有可能嗎？她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因為她們在中學，男女生相處得很愉快，平時聊天的話題也十分自由多樣，某位男生在社團塗鴉留言簿上寫：「我是禁

慾男，我四十天都禁慾」，我女兒就認為四十天禁慾一定是連手淫、自慰都沒有，所以就跑來問我。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還有許多我做一個母親所看到這一代少男少女在性別關係（同性與異性）中的活動與經驗，的確表達遠超出我這一代的過去經驗。

面對這一代少男少女在兩性經驗上比自己這一代的「自由豐富」，我認為暗示要改邪歸正的教化與防堵式的管理策略，並不能有多大教育的作用。因為這些策略是視青少年情慾發展的身心動力為「危險」。如果進行青少年性教育的研究均仍以類似「減低色情傳媒不良影響」與「家長學校一起配合推動有效性教育」為前提來思考，那麼我們對當前青少年生活世界的實相絕對是不得其門而入的！

